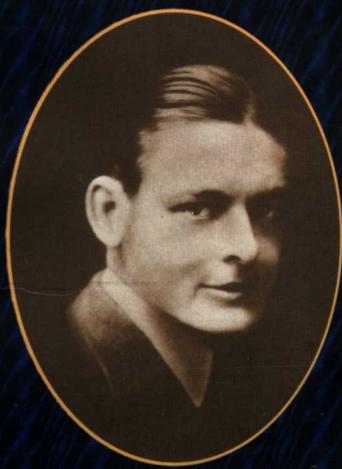


20 SHIJI WENXUE TAIDOU

艾略特

刘燕著



世纪文学泰斗
20

泰斗丛书

K835.6156/51

20 SHIJI WENXUE TAIDOU

艾略特

刘燕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艾略特/刘燕著.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1.9
(泰斗丛书·20世纪文学泰斗/吴元迈主编)
ISBN 7-220-05378-9

I . 艾... II . 刘... III . 艾略特, G. (1819~1881)
-传记 IV . K835.6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9999 号

泰斗丛书·20世纪文学泰斗

AI LUE TE

艾略特

刘 燕 著

责任编辑	孙 毅
封面设计	文小牛
技术设计	杨 潮
责任校对	伍登富
出版发行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盐道街 3 号)
网 址	http://www.books.com
防 盗 版 举 报 电 话	E-mail: scrmebsf@mail.sc.cninfo.net
印 刷	(028)6679239
开 本	四川省印刷技术协会印刷厂
印 张	850mm×1168mm 1/32
插 页	10.75
字 数	4
版 次	204 千
印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数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1-5000 册
定 价	ISBN 7-220-05378-9/I·825
	20.00 元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引言

众所周知，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鼻祖被公认为诗歌领域的艾略特（1888~1965）和小说领域的乔伊斯（1882~1941）。把这两位文学大师的个人生涯作一简单对比是很有意思的。艾略特是美裔英籍人，乔伊斯是爱尔兰人，比艾略特年长6岁。1922年，他们同时发表了现代主义文学的二重奏《荒原》和《尤利西斯》，各自奠定了现代主义诗歌和现代主义小说不可逾越的高峰。令人诧异的是，这两部作品无论是在主题（对人类文明和命运的思考）、结构（神话类比）、题材（表现现代都市的堕落）和表现手法（意识流、蒙太奇、反讽、并置等）上都表现出惊人的一致。而这两位实验大师最终的艺术追求却是截然相反，在《四个四重奏》（1935~1942）与《菲尼根的苏醒》（1939）之间，一个代表了现代主义的终结，一个象征着后现代主义的开始。那么，他们的个人命运有什么异同之处呢？

引言

传记作家们喜欢形象地把乔伊斯誉为现代尤利西斯，因为他以荷马史诗《奥德赛》为榜样，以惊人的才华和不懈的努力构筑了一部现代史诗，而他流浪、坎坷的一生几乎也应证了尤利西斯式的现代漂泊之路：背叛祖国爱尔兰，飘洋过海，自我流放意大利和巴黎，客死异乡苏黎世；乔伊斯一生贫困交加，浪迹天涯，晚年凄楚悲切，最后差不多像荷马一样双目失明，其流离失所的命运和奥德赛长年在海上的漂泊是暗合的，正如他自己在年轻时代就声称的：“流亡就是我的美学。”同样，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把艾略特视为现代但丁，这不仅因为他终生最景仰崇慕的榜样是但丁，而且他的命运几乎也追随着但丁的足迹：经受炼狱之火，穿越地狱之灾，经过孜孜不倦的艰难跋涉，最后进入天堂的玫瑰之路。艾略特是时代的幸运儿，磨难重重之后，终获正果，功德圆满。我们在一个天才所追慕倾心的文化英雄形象中不难寻觅到其本人一生或隐或显的成长轨迹。对乔伊斯来说，他背叛的是故乡爱尔兰，逃离的是那个扼杀天才令人窒息的天主教文化传统，最后走向了一条生命和信仰的不归路；对艾略特来说，他背叛的是出生地美国，逃离的是缺乏历史感和文化传统与秩序的新英格兰，探本溯源，最后永久地回归其祖先的来源地英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从终点又回到起点”。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如果说乔伊斯的一生是直线式的“永在途中”，象征着尤利西斯所体现的希腊文化永无止境的冒险探索精神，背叛、亵渎、颠覆一切既定的神圣，义无返顾；那么，可以说，艾略特的一生则是一个圆圈一次循环：“我的起点就是我的终点”，他在经历了炼狱般的火焰之苦后终于发现了信仰的玫瑰，找到了灵魂的

归宿、永恒的精神家园，可谓“浪子回头”。这从俩人的某些生活细节中就可见一斑，乔伊斯和艾略特为了生存而要拼命地挣钱，都在银行系统做过职员，在学校当过教师，乔伊斯一点也不喜欢银行那种呆板、单调而繁忙的生活（这种地方往往扼杀了他的想像力和灵感）；给学生上课时也总是天马行空，随意发挥，常常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中；他还不习惯在一个地方或一种环境中长期过着有规律的生活，总是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国家漂泊到另一个国家；他曾经经商，涉足电影院和剧院行业，却均以失败而告终；而艾略特却能够适应并很好地在一种非常刻板、沉闷而有节奏的事物性工作中寻找到乐趣，他在劳埃德银行工作了将近十年；在各种各样的编辑部一直从事着烦琐的编辑工作，并以精明而谨慎细致的商业头脑运作杂志和出版社，成为一名成功的文化商人；除了偶尔的出游演讲或访问，他长年累月地定居在伦敦，一住就是51年。

1920年夏天，通过庞德的特意介绍，艾略特和乔伊斯这两位文学天才在巴黎相识了（值得一提的是，庞德同时是他们两人的艺术保护人和经济支助者，众所周知，没有庞德，他们年轻时代在异国他乡的发展和声名无疑会大打折扣。同样，庞德也把他们视为自己亲密伙伴）。这年，身体欠佳的艾略特决定与好友刘易斯一起到法国休养一下，庞德让他们给乔伊斯捎去一个包袱。两人当着乔伊斯的面打开，结果弄得非常尴尬，原来爱开玩笑的庞德赠给这位贫穷的小说家一双自己用过的破靴子。乔伊斯表面上给人彬彬有礼、和蔼可亲的印象，骨子里却傲慢得要命，目空一切，心目中只有他自己，对同时代的其他作家总是采取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两位心高气傲的作家似

乎谁也不买谁的账，相互藐视对方，但乔伊斯对自己艺术才华的充分自信心还是给艾略特留下了深刻印象，而这一点恰恰是他所缺乏的。后来，当有人问起乔伊斯是否读过艾略特的诗歌，他说他不知道艾略特还会写诗，直到阅读了《荒原》，他才说：“真没想到艾略特是个诗人。”其实，乔伊斯还未料想到，在此之前，庞德早已把他与艾略特同时纳入到他的意象主义阵营里，他们一度曾经还是一个战壕中并肩作战的战友呢？

艾略特与乔伊斯两人最终还是成为了好朋友。艾略特回到英国不久之后，认真阅读了乔伊斯《尤利西斯》的最后几章，他激动不已，写信告诉乔伊斯，宁愿自己没有读到这部伟大的作品，因为他对它佩服之极。后来，在一篇名为《〈尤利西斯〉：秩序与神话》的批评文章中，艾略特赞赏到：“乔伊斯先生对《奥德赛》的并行性利用具有巨大的重要性。它具有相当于一项科学发现的重要意义。以前从没有人在这样一个基座上构造过小说。”“在使用神话，构造当代与古代之间的一种连续性并行结构的过程中，乔伊斯先生是在尝试一种新的方法……它只是一种控制的方式，一种构造秩序的方式，一种赋予庞大、无效、混乱的景象，即当代历史，以形状和意义的方式。”这种评论表现出了艾略特独特而超前的批评能力，要知道当时许多著名作家都把《尤利西斯》视为淫秽之作，如伍尔夫夫人就认为它“不堪入目”、“缺乏教养”，而艾略特一眼就看出了这部作品不同凡响的地方，可谓乔伊斯的知音了。《尤利西斯》的出现深深鼓舞着艾略特正在进行之中的《荒原》写作，因为它再一次证实了他试图在诗歌中达到的理想，即把现代社会混乱复杂、支离破碎的存在融入到一个有机整体或秩序之中，使

现代文明支离破碎的现象显现出内在的深刻意义。可以说，在乔伊斯的小说《尤利西斯》和艾略特的诗歌《荒原》那里，同时进行着一次前所未有的艺术革命，这种包含着结构、理性、秩序的古典形式（有关奥德赛和圣杯的神话传说）恰恰是赋予混乱无序的现代社会以秩序和意义的一种有效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小说和现代诗歌对形式、结构、秩序的强调在目的上是一致的，乔伊斯和艾略特同时敏感地觉察和把握到了现代文化传统的全面危机，不约而同地倡导一种新的美学原则来弥补现代人与过去传统的失落感，这从另一方面体现了他们强烈的历史关怀和价值取向。艾略特是最早认可乔伊斯《尤利西斯》杰出艺术成就的批评家之一，也许这种认同来源于他自己的艺术探索与乔伊斯殊途同归。所以，尽管艾略特与乔伊斯在家庭成长背景与个人气质上相差甚远，但他们在艺术道路上的探索却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比如，他们俩人都是学识渊博、才思敏锐的天才，谙熟自古希腊以来西方文化，对文学、历史、神话、语言学、神学、哲学、美学、音乐、医学、生物学、巫术等领域无不涉猎；他们都十分热爱意大利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尤其是以阿奎那和但丁为自己的榜样。《尤利西斯》和《荒原》中充斥的英语、法语、德语、拉丁语、希腊语、意大利语、梵语等十几种语言以及来自各种文化的神话、典故、民间传说、引语、隐喻和其他论著等，令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在文学倡导上，俩人也不谋而合，如艾略特的反浪漫主义、“逃避情感”、“非个性化理论”等理论主张与乔伊斯的现实主义、文学“三个阶段”论、小说的戏剧化等理论主张就非常相同。

引言

•

引言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乔伊斯可视为现代尤利西斯，艾略特可视为现代但丁。荷马在史诗《奥德赛》中讲述了奥德赛在大海这一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的挣扎与磨炼，它展现的是人间的世俗的肉体和精神及艺术的漂泊；而巨著《神曲》则是诗人但丁在自己幻想的地狱－炼狱－天堂中经历了曲折的精神漫游和精神求索，它是宗教的超俗的精神之堕落与上升。但丁的求索之路与其说是宗教意义的，不如说是人类永恒的精神求索，是有关人类精神的堕落与拯救的故事。因此在本质上，荷马与但丁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方式表现了人类同样的精神探索。从这个文学传统来看，艾略特和乔伊斯同样是继承了古希腊罗马以来西方文化的精神求索之路。恩格斯曾经认为但丁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又是新世纪的最初一位诗人”，也就是说，但丁力图告别或埋葬一个旧时代（旧信仰），展现一个新时代（新信仰），是一个继往开来的文化英雄。对于这位文学前辈，乔伊斯与艾略特表现出同样的热情和热爱，乔伊斯曾经满怀赞叹地说：“意大利文学始于但丁，也终于但丁。但丁充分体现了文艺复兴的精神。我爱但丁犹如爱《圣经》。他的作品是我的精神食粮。”乔伊斯对这位意大利诗人了如指掌，以至于在同学中获得了“都柏林的但丁”的称号；在艾略特眼中，但丁似乎代表了一个未曾失落的乐园，象征着一个真正的欧洲文化统一性和理想性的历史时刻，他称这位意大利诗人是“所有现代语言中最具有普遍性的诗人”，“但丁的文化不是哪个欧洲国家的文化，而是欧洲的文化”。更不必提他作品中所体现的但丁的精神了，因此，庞德声称艾略特代表了英语中真正的但丁声音；诺贝尔文学奖也夸赞艾略特“不论处于什么环境下，始

终如一地扮演着但丁的最后一位传人的角色。”如果我们把荷马、维吉尔、但丁、歌德、艾略特、乔伊斯等这些文化英雄们看做是一种前赴后继的传统链条，就不难发现，正是这些披荆斩棘的先行者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文化转型时期，引领着我们满怀希望和信念穿越人间地狱的痛苦煎熬，走出黑暗的荒原世界，正是他们为我们带来了圣杯与甘霖、火焰与玫瑰，他们是不朽的。

二

如果继续把乔伊斯与艾略特的一生作一番对比的话，命运似乎显现着某种不可理喻、无法琢磨的力量。乔伊斯的一生一直是漂泊动荡，贫穷、疾病缠身，他呕心沥血，用七年时间创作了传世之著《尤利西斯》，在世之时不仅未获得过任何荣誉，而且还备受世人的责备、冷漠与歧视，被人辱骂为“色情作家”和“疯子”，《尤利西斯》一度在英美两国禁止出版，还以“猥亵”、“淫秽”的罪名被送上了法庭。乔伊斯后半生花费了16年时间精心创作的《菲尼根的苏醒》终极了现代小说文体的实验，却以未获得普遍的认可与赞赏而告终，这位苦难的天才在后半生不仅要忍受来自几近失眠的痛苦和疾病的折磨，而且还要承受女儿精神分裂这一沉重的打击，未满60岁的他走完了痛苦曲折、凄凉寂寞的一生，客死异乡，最后是寥寥几个亲戚朋友把他埋葬在苏黎世一个普通的公墓里，在他死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未获得当世人的嘉奖，更不必说他的故乡爱尔兰了（自从他的第一本小说《都柏林人》1912年被拒绝出版后，

他就再也没有踏上故乡的土地了)。而相比之下，艾略特则幸运得多了，自从他较为顺利地发表《荒原》以来，就成为一代年轻人追随的文化英雄，荣誉遍身，他一生中多次衣锦还乡，荣归故里，被邀请在著名大学讲学，还被许多大学授予荣誉博士的称号，尤其是在晚年功成名就，幸福融融，不仅以其和谐完美之作《四个四重奏》荣获 1948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而且赢得了迟到的甜蜜婚姻，最后叶落归根，长眠于伦敦西敏寺大教堂，与华兹华斯、丁尼生等伟大诗人们安息在一起，在美国和英国的文学史上都留下了他的光辉名字。也难怪有许多后来人为乔伊斯打抱不平，喊冤叫屈，责备 20 世纪诺贝尔文学奖没有授予他是一个极大的过错。不过，命运最终还是会显现出某种公正性，一个明显的事就是，在 20 世纪下半叶，乔伊斯在文坛的声誉反而比艾略特更高，当艾略特作为保守的过时者被后来的年轻人嗤之以鼻、连喊打倒时，乔伊斯则往往被视为后现代主义的开拓者而受到推崇，美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哈桑就把后现代主义兴起的时间上限划为 1939 年《菲尼根的苏醒》出版的那一年。在新一代读者的心目中，乔伊斯的名字比艾略特更亲切可爱，更充满吸引力。

这就不难理解，同样是最具有反叛精神、先锋力度的乔伊斯和艾略特，一个以其坚忍的执着叛逆最终背弃了天主教文化传统(当然，其作品中又体现了基督教文化对他的深刻影响)，一个却以其信仰的虔诚最终拥抱了天主教文化传统(当然，其作品同样体现了异教文化的深刻影响)。我们看到，“上帝死了”的预言和“走向上帝”的求索在乔伊斯和艾略特身上构成了现代主义奇妙的文化景观，它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 20 世

纪上半叶西方文化复杂矛盾、充满悖论的一面。具体而言，乔伊斯从小生活在一个天主教戒律苛刻、甚至是压抑自由、窒息个性的环境中，他受家庭的影响自幼信仰天主教，长大以后逐渐认识到教士的虚伪，经过激烈的精神痛苦挣扎，毅然与天主教会决裂；哪怕是母亲在弥留之际哀求他重新皈依宗教，乔伊斯依然毫不动摇地违背母亲的遗愿，为此而负疚终身。相比之下，艾略特则是生活在一个信仰惟一神教而有着清教倾向的家庭，年轻时代的艾略特也背叛了家族的宗教，一度成为一个毫无信仰的怀疑主义者，但天性倾向于约束和纪律的他，终于在英国国教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归宿，而这正是他最早祖先的根。事实上，背叛信仰（上帝）与皈依信仰（上帝）的痛苦探索在 20 世纪许多天才思想家之间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张力：在背叛信仰的一边站立着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白壁德、卡夫卡、海明威、劳伦斯等人，在捍卫信仰的一边站立着克尔凯郭尔、舍斯托夫、道森、马丁·布伯、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人。在此两者之间，则是不少像艾略特这样的人，经历过从年轻时代的背叛和晚年时代的皈依，在痛苦矛盾的挣扎之后获得了天堂的甘霖，如波德莱尔、奥登，甚至还包括中国的林语堂。而另有一些人则是像乔伊斯这样坚定的无神论者，拒绝任何一种信仰，宁愿一辈子自我放逐，或者对他们来说，惟一的信仰就是艺术。

无论是艾略特，还是乔伊斯，他们都成为 20 世纪世界文坛重量级的大师，都不可不了解，不可不阅读。因为处于同一个时代和文化氛围中，最初他们的反叛与创造精神是相似的一致的，他们成为现代主义文学披荆斩棘的开拓者；但后来由于

彼此的个性、气质、信仰和艺术追求的不同，他们最终分道扬镳。有人认为：“如果说诗人艾略特富于哲学家的气质，那么小说家乔伊斯则更富于诗人气质。”这种说法很有道理，艾略特是学哲学出身，他的探索带有强烈的理性色彩和形而上的激情，他一生追寻的是秩序、形式与戒律，以及他所生活的时代已经失落了的生命价值，其作品充满着悲天悯人的宗教意识和救世情怀；而乔伊斯更热爱世俗生活的一面，更沉迷于形而下的现实感性的东西，就像一位病理学家潜心于探索人的内心世界的复杂与幽暗，其作品在对人的欲望、心理、潜意识的挖掘上无人可比。因此，乔伊斯一生的努力主要集中于小说的形式革命，他对于文学语言、叙事形式、艺术之极大可能性的探索比艾略特更先锋更激进也更持续；而艾略特一生的努力则更多是集中在精神的探索上，更重视对人类（尤其是现代人）精神的深刻揭示与终极关怀。当然，这并不否认乔伊斯在对现代人精神的剖析上有独特的贡献，也不否认艾略特在对现代诗歌艺术技巧的实验上有惊人的创造，只不过两位天才的努力方向开始是同道最后却是殊途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乔伊斯走向了艺术实验的极致，为信仰而艺术的艾略特则走向了开遍玫瑰花的伊甸园，在《菲尼根的苏醒》与《四个四重奏》之间，一个是叙述语言的革命文本，一个是精神信仰的皈依文本。因此，乔伊斯之类的作家也好，艾略特之类的作家也好，他们身上都体现了文学艺术自身存在的目的：既是对叙事领域的无穷探索又是对精神世界的无限追求，而对我们来说这两者往往是相互关联，缺一不可的。

三

艾略特生前一直反对从作家心理、个人经验、传记材料等外在方面认识其创作文本，提倡“诚实的批评和敏感的鉴赏，并不注意诗人，而注意诗”。其实这种手法只是艾略特的一种批评策略罢了，为了建构基于文本的本体论批评，当然要排斥传统的批评家专注于作家个人的生活经验及其成长的社会环境的做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的传记研究无足轻重。艾略特本人也说过，个人才能与其涉及的文化传统有着深厚的关联，而传统对自我的熏染则来自家庭、教育、阅读、婚姻、交往、迁徙等个人经验的整个领域，事实表明，这些形成一个人充满活力的思想的背景知识仍然是我们认识文学天才们的有效途径之一。对于任何一个作家来说，自己在现实世界中所遭遇的个人经验（世俗生活）与在想象世界中所面临的艺术经验（精神生活）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揭示这两者的隐秘关系就成为有关作家传记的主要宗旨。在一个诗人的成长生涯中，以明确的形态表达出来的各种思想或艺术性的冲动，其最初的创作动机与个人生活中的具体事件有何关联，实在不容易辨析。整体上而言，艾略特一生中缺少惊心动魄或具有传奇性色彩的事件，哪怕是他的恋爱也显得那么的索然寡味（也可能与他的保密和缄默有关）。与许多作家艺术家相比，艾略特的一生只算得上非常平淡的了，但我们却常常感觉到，在他的作品中显示的博大精深和雄伟浩瀚背后，具有一种由平凡普通的日常生活经验累计而成的强大的思想力量和艺术想像力。从另一个角度

引言

来看，现代主义艺术家不同于其前辈浪漫主义艺术家们，他们艺术灵感的另一部分来自于极其平凡、琐细的生活而非剧烈的个人情感体验，来自于教室与图书馆中的博览群书、写作过程中的某种知识或感动而非乌托邦的幻想激情。也就是说，他们更实际更平凡更缺乏诗意了，正如艾略特笔下的普鲁弗洛克，一切浪漫也许只能在想象中发生，很快就被现实的残酷打碎了，并给予嘲讽的一击。这种力量不是更令人揪心，更接近我们普通人的感受吗？我们看到，现代作家不再愿意提供给我们可望而不可及的轻飘飘的催泪弹，而是普普通通的但却更具有思想力度、与我们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启悟。那么，通过一个作家成长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启悟来源于何处，以及它们如何被作家转换成杰出的艺术素材，从而揭示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与我们的关系。

随着艾略特巨大身影的离去，尤其是以他为始的新批评在20世纪后半叶的衰弱，批评家们和传记家们开始重新审视艾略特时代被奉为经典的批评观念，而且越来越重视揭示被“非个性化”面具伪装得严严实实的那个“个性化”的艾略特，寻觅他的个人生活经验与其创作文本之间的隐秘关系。例如，在《艾略特的新生》一书中，批评家L.戈登发现艾略特对年轻时代的女友艾米丽·赫尔的不完满的爱情在他的精神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对第一任妻子的痛苦破碎的爱情也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因为她们使得艾略特理解了人类的空虚和堕落。J.M.米勒在他所著的《T.S.艾略特的私人荒原：驱逐妖魔》（1977）一书中，把《荒原》解释为艾略特个人生活的炼狱，这部作品成为释放作家个人焦虑和满腹牢骚的东西。D.J.

吉德斯所著《T.S. 艾略特：神秘家、儿子和情人》（1997）则认为艾略特在二十年来有关劳伦斯的写作中，千方百计地用一种心理病理学来解释劳伦斯，试图把自己与之区别开来，这恰好揭示了他害怕自己遭受“恋母情结”的焦虑，揭示了他从第一次失败的婚姻中所发展出来的几乎病态的厌女症。作为受压抑的儿子和厌女症的情人，像劳伦斯一样，艾略特的个人情感也经受了痛苦的折磨。所有这些对文学作品或批评的传记式的阐释都尽可能地在作家个人经验世界与其艺术创作世界之间寻找某种曲折隐晦的关联，为我们通向一个伟大的、创造的、复杂的心灵提供了一条理解途径。

艾略特自己曾经承认，他最优秀的诗歌使他在生活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说明了一个艺术家的创作与个人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将发现，越是最具个性化的作家，越是能够把自己的个人遭遇与体验升华为与众不同的艺术品。于是，在《荒原》与其创作者之间，我们看到了同一个艾略特的两面，他既是呕心沥血的杰出的艺术家，又是牢骚满腹的失意的丈夫。

引言

目 录

引 言 [1]

第 1 章 长大成才 (1888~1914) ... [1]

- 第一节 名门之后 [1]
- 第二节 哈佛求学 [8]
- 第三节 巴黎游历 [20]
- 第四节 哲学之光 [25]

第 2 章 背井离乡 (1914~1920) [34]

- 第一节 定居伦敦 [34]
- 第二节 异国婚姻 [50]
- 第三节 养家糊口 [57]
- 第四节 艰苦奋斗 [67]
- 第五节 文坛新秀 [74]

第 3 章 穿越炼狱 (1920~1926) [89]

- 第一节 荒原之路 [89]
- 第二节 贫困交加 [120]

目
录